

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光辉文献

学习《邓小平文选》辅导报告

姜思毅

社

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 光辉文献

——学习《邓小平文选》辅导报告

姜思毅

战士出版社

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光辉文献

——学习《邓小平文选》辅导报告

姜思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214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印张3.25 字数55,000

1983年8月第一版 1983年8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85·14 定价: 0.32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一) 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 (3)
- (二) 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 (8)
 - 第一，解放思想，坚决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9)
 - 第二，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 (16)
 - 第三，从实际出发，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21)
- (三) 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 (31)
 - 第一，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33)
 - 第二，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40)
 - 第三，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2)
 - 第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56)

(四) 三中全会以来的组织路线	(60)
第一，选拔培养接班人和改革党的干部制度	(62)
第二，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的领导制度	(72)
第三，整顿党风	(78)
(五) 三中全会以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针	(86)
第一，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加强国防建设，实现国防现代化	(87)
第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88)
第三，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合成的原则、提高效能和平战结合的原则，抓好体制改革	(89)
第四，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的位置	(90)
第五，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91)
第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先进的军事思想指导军队建设	(92)
第七，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	(94)
(六) 学习《邓小平文选》，要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二大文件结合起来	(96)

盼望已久的《邓小平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出版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文选》是在我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产生的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著作。它真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这个阶段中，指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创新，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发挥的决策作用和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现了他解决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首创精神，和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民主作风。《文选》对党和国家在这个时期内的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和理论的阐述，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思想支柱。学习好《文选》，可以加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十二大精神的理解，对进一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对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即将展开的整党，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指导意义。

党中央和军委、总政治部要求全军干部在继续深入学习十二大文件的同时，认真学习《文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以下简称《选编》）、《陈云文稿选编》三本重要的政治理论书籍，其中以学习《文选》为重点。为了帮助大家学习《文选》，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成果，有必要对《文选》和《选编》作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选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七中全会的四年间，党领导人民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转变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将新的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重要文献，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恢复、坚持和发展。结合《选编》学习《文选》，回顾党领导人民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战斗历程，对于学习《文选》和十二大文件，对于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排除右的干扰，提高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更坚定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文选》是把全党全军的认识统一到党的三中全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十二大纲领上来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整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大家都应努力学习。

(一) 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

《文选》和《选编》是历史的产物，是为解决党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而产生的。要正确地理解这些历史文献，“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文选》的主要部分和三中全会以来的其他文献，与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历史有什么基本的联系呢？最主要、最基本的历史联系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危难中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百乱待理、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极其紧迫而又非常艰难的局面。人民在经历十年内乱之后，在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的同时，人心思定，人心思治，要求政治上安定，生活上改善，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地推向前进。

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种种复杂情况，由于长期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党对全面清理“左”倾错误的思想准备是不够的，加上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着“左”的错误，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就造成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党的工作呈现徘徊前进的局面。一方面，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揭发批判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夺回了被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部分地开始了对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经济工作、科学教育和文化工作也开始恢复。这些，较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明显是前进了。但是，这种前进的步伐是缓慢而徘徊的。另一方面，这两年中，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工作上暴露了许多问题。本质的问题是党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期性的“左”倾错误方面徘徊不前，并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失误，因而没有取得人民期望的、本来应当取得的更多的成就。

这时，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党内出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这个历史事实中，开始进行深入的思索和探讨：“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正确的吗？这场被称为旨在“反修防修”的政治大革命为什么反而出现和结成了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反革命集团，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能在党内如此猖狂，以致祸国殃民长达十年之久？怎样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这类灾难在中国重复出现呢？等等。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人们的理性思索不断深化，越来越认识到，林彪、“四人帮”赖以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政策。要防止再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和林彪、“四人帮”这样的祸害，党必须要彻底纠正“左”倾错误。这是党内外干部和

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可是，群众的这种认识和要求却遭到一些领导人严重的阻碍和压制。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批评，被非难为“右倾”和“修正主义”；人们希望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出来工作的呼声，被当作“反革命谣言”追查；人们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评，被指责为“砍旗”等等。这种阻力，除了长期“左”倾思想的影响外，主要是来自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继续维护和推行“左”的理论和方针。在思想上，他提出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行“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其实质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下来。在政治上，他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口号，而且肯定“‘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他还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纠正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借故阻挠；人民希望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出来工作，他百般拖延，甚至要邓小平同志出面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以作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一个条件。这理所当然地遭到邓小平同

志的拒绝。邓小平同志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在组织上，华国锋同志未能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党和国家生活中不仅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还欣赏和鼓励对他自己的新的个人崇拜。在经济上，继续执行过去的急躁冒进等一些“左”的经济政策。总之，华国锋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工作上代表和维护着“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东西，与党内外要求纠正“左”倾错误的正确主张，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很明显，如果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如果不制止华国锋同志坚持和推行这种“左”倾错误的行为，那么，党和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取得的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就不能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不能大踏步地前进，而只能在徘徊中来回折腾，以致继续遭受挫折。这样，在一定的条件下，重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是不可能的。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党的面前：依靠华国锋同志的方针和领导，不能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和两年徘徊期间的“左”倾错误。只有依靠党中央的集体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倡导，才能开始历史的大转折。这是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产生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的大量重要著作和一系列文献

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联系（或历史背景）。

其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更为深远的历史联系，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倾思想和“左”倾错误。思想上的“顶峰论”，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的急于求成，党内生活上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等“左”的倾向，是一九五七年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左”倾思想曾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重要思想基础。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两年徘徊期间的“左”倾错误，开辟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新道路，一定要解决二十年间积累的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外也曾尖锐地提了出来。如“反右派”、“反右倾”斗争是不是“左”了？“三面红旗”怎么样？彭德怀同志向党反映情况和意见何罪之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对不对？等等。这些历史的重大问题都有待党作出正确的认识，总结出经验教训。

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揭示了历史的教训，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结束了徘徊局面。这是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伟大转折。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七中全会，直到十二大，在党的

指导思想上全面拨乱反正，卓有成效地纠正了“左”倾错误，使党的领导和党的路线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党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和解决了许多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引上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广阔道路。《文选》和《选编》中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就是党的这些实践活动和理论创造的结晶。

（二）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

《选编》精选了党的重要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章、书信、手稿一百零四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本是二百五十六篇，本书有时也将引用《汇编》中的某些文献），其中收录了载入《文选》的大量重要文稿。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统战、法律、军事、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我们在学习中怎样把握贯穿着《文选》和《选编》的主线，有重点地学习领会主要的精神实质呢？我们认为，从当前广大干部学习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文选》和《选编》，要围绕“一个中心”（即拨乱反正、改革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抓住“三条路线”和“一个方针”（即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队建设方针），从历史和现实、理

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肃清“左”和右的思想影响，从而进一步增强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

下面以“三条路线”、“一个方针”为线索，谈谈结合《选编》学习《文选》的主要内容和学习体会。

先讲思想路线。

胡耀邦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拨乱反正，归根到底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走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就是说，拨乱反正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就没有思想基础。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是三中全会前后党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贯穿党的工作的全过程。《选编》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胡耀邦同志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献，都有深刻的论述。学习这个问题，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解放思想，坚决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什么在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前夜，要提出解放思想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呢？首先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党内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倾向发展起来，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次是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解决了敌我矛盾的问题，但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破坏了的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不少同志思想不解放，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选编》第20—21页；《文选》第131—132页）由于这四个方面的历史原因，因此，人们“不去想问题”，也“用不着思考”，“不愿意去动脑筋了”。他还指出：“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

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他非常尖锐地讲道：“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选编》第22页；《文选》第133页）他后来还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文选》第176页）

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必须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什么是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汇编》第524页；《文选》第242页）什么叫解放思想呢？他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上第524页；《文选》第243页）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选编》第638页；《文选》第323页）

为了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党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和激烈的斗争。首先，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开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一九七

七年二月，“两个凡是”刚出来，四月，邓小平同志就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五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当着汪东兴同志的面尖锐地指出，搞“两个凡是”不行，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文选》第35页）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是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七月，他在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他的领导职务时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中，再次指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文选》第40页）一九七九年七月，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选》第175页）后来，他又尖锐地指出过：“‘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选编》第451页；《文选》第262页）

其次，党内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写文章和发表讲话，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宣传党的历史上反对教条主义和“左”倾、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推动了思想解放。聂荣臻同志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徐向前同志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